

记忆深处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。父母都是老师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各自吃住在学校，每天从早自习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。母亲一个人没法照顾小孩，所以，我们兄妹两个出生后，都请了保姆帮忙。大哥1岁的时候，被送到姥姥家寄养；我周岁后，父母便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个保姆，全托在她家，前后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。

保姆当时50多岁，我叫她奶奶。奶奶有一个儿子（我叫他伯伯），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生养。父母选定他家，也是看中他家没有小孩，可以专心带我。

奶奶是一位小脚老太太。她的房间用花纸糊了顶棚和墙围，院子里种了一棵桃树。她每天颠着小脚忙来忙去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不记得吃桃子，只记得春天满院粉嫩的桃花，和糊在炕边上的墙纸一样，好看极了。

奶奶是一个爱干净的人。每天，她都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，在脑后挽成一个纂儿，用黑

色的网罩住。她把掉下来的头发缠成一个团收起来，等换东西的来了，就可以换些针线之类的小物件。她出门穿的衣服洗了要浆，还要捶，捶得挺括舒展，看着就利利索索的。我特别喜欢那个捶衣服的棒槌，当然，我调皮的时候，也会被奶奶拿着棒槌追。但是她小脚跑不快，我从来没有被追上过。

奶奶的针线活很好，经常有人找她要绣花样子，或者找她帮忙做小孩的虎头鞋、虎头枕，她会把零碎的花布攒起来，拼接成一个小褥子或者小书包。我的衣服鞋袜也是奶奶给做。记得有一年，奶奶给我做了一个红缎面的斗篷，四周镶了一圈白色兔毛，我披上斗篷着实好看，出门就会被大家围着夸赞。

但奶奶经常骂人，骂一个老头“老不死的”。

奶奶骂的那个人其实是她老伴。她不跟他一起住，也不让我喊他爷爷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年轻的年代，有钱的人经常要娶姨太太。奶奶受不了他在外

面娶了外室，就带着儿子出来自立门户了。虽然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，却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看来，奶奶是一个非常骨气的人。

奶奶除了骂那个老头，对别人都很好。有一年，村里来了许多讨饭的，说是河南遭了水灾。奶奶一边感叹，一边把锅里所剩不多的干粮拿出来给他们吃。

我在奶奶家的时候，是1970年前后，谁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。拿奶奶家来说，白面馒头和面条只给下地干活的伯伯吃，奶奶和大娘只能吃粗粮。菜也没什么可吃的，我只记得每顿饭都有辣椒面做的糊糊当咸菜。当然，我自带粮票，可以和伯伯一起吃细粮。

我在奶奶家住着，三个大人围着我一个人转，和现在的独生子女享受一样的待遇。后来，要上学了，母亲才把我接到身边。但每到周末或是暑假，我都要到奶奶家去住几天。有时，在母亲这儿受了委屈，也会嚷着要“回家”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认为保

姆奶奶家才是我的家。

奶奶一如既往地疼我，虽然没了保姆费，依然给我做棉衣、棉鞋，一直做到我上了初中，开始嫌弃棉鞋丑，奶奶才不做了。每年地里的花生、玉米下来，奶奶也会第一时间让伯伯送过来给我尝鲜。

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我的亲奶奶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我时常买了东西回去看望奶奶。她的身体很好，直到70多岁，还能上房扫雪。

奶奶不服老，但终究还是老了。有一次不小心，她从房上摔下来，再没醒过来。

奶奶走了，似乎把我的童年也带走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会时常想起她。但我却发现，我不知道她姓什么、叫什么、出生在哪里。

她们那辈的女人，好多都没有自己的姓名。如果可以，我很想回到过去，问一声：“奶奶，我叫做什么，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吗？”

晨曦/文

朝花夕拾

家乡的潞龙河

我的老家在保定蠡县北绪口村，紧靠潞龙河西岸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潞龙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潞龙河如同一条长长的银带，蜿蜒曲折流淌在绿意盎然的田野之间。清澈的河水中，成群结对的鱼儿游来游去。潞龙河两岸，绿树成荫，微风轻轻吹过，垂柳轻拂着碧波荡漾的河面，仿佛在诉说岁月的故事。

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，土地肥沃。上世纪50年代，国家号召农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父亲是共产党员，对党忠诚，深得群众信任，被社员们推选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。父亲不但搞好了农业生产，还抓副业。他农忙时节抓农业，闲时搞副业，在村里成立了织布厂，订立了奖惩制度，把生产队搞得红红火火。父亲发动社员每户织鱼网6米，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大网，发动年轻人下河捕鱼，我记得一网能捕几百斤鱼，不但改善了社员生活，还能卖钱分红。

如今，我86岁了，常回忆起家乡潞龙河的美景，表达自己对家乡、对美好时光的怀念。

韩秀菊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所有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

为战友号房

1964年，我们部队要去农场种地。农场在黑龙省克山县北联公社建设大队。因为农场刚建成，还没有宿舍，各连队要派小分队先行去号老乡的房子来住，安顿好起火做饭

的地方。

4月的一天，我带领我们连队的小分队奔赴农场。为了尽量不给老乡添麻烦，增加负担，在号房时主动号老乡家的仓房、简陋的棚子等，清理打扫

后成为战友的“宿舍”。在号房过程中，老乡们都热心相待，主动让房、腾房，尽全力支持，体现出对子弟兵的关爱。

有一天晚上下雨，我们住的棚子漏雨，我和战友们就把

雨衣盖在被子上，照样睡得香，早晨醒来时我们的被子都被雨水打湿了，可谁都没有怨言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是为国家生产粮食来了。

秦连鸣/文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

天津人郑西斌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和姑姑们的合影

我在老家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出生，父母是农民，靠辛勤劳动把我养大成人。长大后，我到了新疆工作和生活。1968年我1岁半时，母亲（图中）抱着我，我大姑（图右）、二姑（图左）抱着两个表弟，到县城东风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合影。

程凤玲/文并供图

似水流年

我的红旗牌自行车

上世纪70年代，生活物资相对紧缺，尤其是购买大件商品，更是需要凭票供应。当时，我们邢台市的商业局每年都会发放自行车票，但是，发到基层的数量极少。我的单位是一家机械制造厂，约有200余人，一年只能分到两张票，根本无法满足职工的需求。

1970年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迫切需要一辆自行车。然而，我只是个学徒工，想要得到一张自行车票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步行上下班。

父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他说，一定要为我买辆自行车。父亲在一家大型企业的医务室工作。一天，运输队司机王师傅来到医务室，找父亲看病。诊断治疗完毕之后，父亲和王师傅谈起买自行车的事，烦请王师傅到天津拉货、送货时，帮忙买辆自行车，任何牌子都行。王师傅满口答应下来。父亲下班回到家后，将此事告诉我。听完之后，我高兴极了。心里暗想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再也不用走路下

下班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天天盼望着早日把自行车买回来。

大约过了半个多月，王师傅真的为我买来了自行车，是天津产的红旗牌自行车，并且开着汽车直接送到我家里。顿时，我兴奋不已。听王师傅讲，在天津的商场买自行车更难，不但凭票还要工业券。他是找天津的战友帮忙才买到的。听罢王师傅的讲述，我的感激之情真是无法言说。

第二天，当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来到厂里时，工友们一下子围了过来，上下打量着，个个羡慕不已。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着我，直至我退休后它才退役。

张福祥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